

“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

一、“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反击

2003年，我批樊教授的“伪善亦善”论，指出此说彻底颠覆了形式逻辑。有的网友说，该论确实违反了逻辑学的排中律，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能成立，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逻辑思维是有限的，不要过分强调。

此后我重新贴出《疯人自答说老子》，指出《老子》中的许多低级智力错误，并推出几篇“言必称希腊”的文字，介绍某些古希腊大家的智力成就，将其与中国古代所谓“大科学家”的搞笑活动相比，告诉大家中国人之所以愚昧，是没像西方人一样，从远古时代就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逻辑思维。要结束这种悠久的愚昧传统，唯一的希望就是从此建立合理的思维方式。

这些文章推出后，人之初网友便上贴批驳（见文末附录），大意是：第一，我提出的“凡不符合逻辑的思维就是错误的思维”不成立，起码不符合统计学和量子力学；第二，老子是辩证思维，不能以实证主义去验证，否则就是关公战秦琼；第三，我那些文字出自“自认劣等民族的奴才心理”，是“以成败论聪明”，他并教育我“拼命煽自己耳光的人永远得不到尊敬”。

前段有人把我的《中国人会思维吗》换了个题目转贴到《凯迪网》去，引来爱国同志反驳。那文字被网友转贴到《罕见奇谈》，我也没有打开看，知道那反驳多半和人之初说的差不多。

这些反驳我其实早在青少年时代就从我党那儿听熟了，那就是形式逻辑的用途很有限，过份强调就会滑入形而上学的泥坑。我那阵子是狂热毛教徒，精通所谓“辩证逻辑”，而且颇能“活学活用”，真个如同伟大领袖在徐寅生同志《怎样打乒乓球》的讲话后赞美的那样：“处处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要到70年代初的地下读书运动中，我为了破除这符咒，出大力流大汗啃大部头，看了许多哲学书，才最终清算了那些智力垃圾。那阵子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张闻天等人在延安整风中反复沉痛忏悔的死罪之一，便是中了形式逻辑的毒（请参看高华先生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上网7年的经历，让我倍感痛切地意识到，我党猛批形式逻辑，鼓吹所谓“高等思维方式”辩证逻辑，犯下了两重大罪，首先是让本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习惯的国人的思维更加混乱；其次是它如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样，给愚昧的国人莫名其妙地造成一种大愚若智、昏昏如昭的狂妄虚骄心理，使得夜郎国公民们的愚昧更加难以破除。看来不扫荡这所谓“辩证逻辑”的胡言乱语，中国伪知识分子们便永远没有从那致愚魔咒下解脱出来的希望。

有鉴于此，我把30多年前学哲学的一点心得写在下面。因为时间久远，我已无法准确判断哪些是原作者的思想，哪些是我个人的穿凿发挥，虽然写作前匆忙查了一下有关参考书籍，仍无法准确一一判别。倘有误解甚至歪曲大师之处，尚请方家指正，谢谢！

二、形式逻辑是从哪儿来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眉毛。是人类头脑里固有的么？噎死！”（我这是疯狂篡改伟大领袖语录，不熟悉 小红书的青年同志请勿认真）形式逻辑乃是思维本身的规律，是大脑固有的属性，并不是如伟大领袖或一切朴素的大老粗那样认为的那样，“只能从社会实践中 来。”

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都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后者是前者在数量上的表达，两者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正因为此，早在古希腊时代，数学和 逻辑学就相当发达了。逻辑学的基本框架是在公元前 4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手上搭起来的，他不但第一个明确给出了演绎法三段论的标准格式，而且还确定了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逻辑学基本规律。正因为逻辑学在一开头就获得了长足进步，此后近千年内都没有什么发展，直到 12 世纪，法国神学家兼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写了本《辩证法》，讨论了转化、否定、量和质等等，才扩充了逻辑学领域。似乎可以说，人类开始显示其思维功能之日，也就是数学和逻辑问世之时。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就出现得很晚。如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最先发展起来的学科，后来化学和生物学才跟了上来。即令如此，也要迟至 16 世纪，实验物理学才在伽利略手上正式问世。这说明了数学和逻辑学不以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其发生和发展也不依赖实证手段。所以，离开实验室就没有自然科学，而人类至今也不曾建立什么“数学实验室”或“逻辑学实验室”。物理学最先发展起来的原因，在我看来与数学超前发展密不可分。物理学是依赖数学最严重的一门自然科学，离开数学就没有物理学。牛顿把他的巨著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非常准确地点破了物理学的实质乃是人类用大脑自由创造的数学去穿凿大自然。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形式逻辑乃是思维的固有属性的缘故。此话其实出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老先生。老先生把他的发现称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认为它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颠倒了人类认识外界的思维方式。其实老康太谦虚了，哥白尼不过是把“太阳围绕地球转”的传统看法颠倒成“地球围绕太阳转”，而 康老在认识论上发动的革命难度和意义都远远胜过日心说。

在康老之前，著名的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认为，“存在即被感知”。唯物论者虽然反对此说，其实在本质上认同它。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指出过了，唯物论者 特别是无神论者的基本假定就是“不能被感知的必然不存在”。无论是上帝，是天堂，是地狱，都无法为人类感知证明，所以它们统统不存在。有趣的是，无神论者 们没谁意识到，这句话若变换为等价的逆否命题，就成了“凡存在的就能被感知”，和他们反对的贝克莱如出一辙。在两者看来，所谓客观世界，其实也就是人类的 感知范围。

康老则认为不然。在他看来，人类认识外界客观存在乃是通过两个层次进行的，第一个是通过人类主观具有的各种“感知形式”，由此获得感性经验，然后再通过人类固有的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去思索理解外界事物。“空间”、“时间”等观念就是这类先于经验存在的固有观念。因为事物只能以我们固有的感知形式去感受，以 我们固有的智能去理解，所以我们只能以按其感知中出现的那样去认识它们，但不可能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样。既往哲学家们，不管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其实都弄颠倒了，不是感知迁就（conform）外界，而

是外界迁就感知。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看出形式逻辑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老康说的人类头脑固有的抽象概念和范畴，就是我们整理大自然的框架。人类思维只能在这框架中进行，也只能依照这框架去把杂乱无章、千头万绪的自然界理出个条理来。在这中间，我们其实引入了一个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的假设，那就是自然界存在着一套所谓“客观规律”，它也同思维的固有规则一致。

这在经典力学的诞生中表现得最明显。牛顿作出那一系列划时代的发现的基本假定，是物体机械运动背后有一套支配它们的规律（law），这些规律和人类遵照逻辑规则发明的数学定理（theorem）其实是一致的。基于这假设，他以后者去穿凿前者，最后把全宇宙从行星运动到苹果坠地都统一在数学公式中。这从此成了物理学的传统。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但凡观察到的现象突破了原来的假定，科学家们便再去发明一套数学理论体系，再度假定宇宙运行规律符合他们的自由发明，什么张量分析、非欧几何、弦理论等等无一不是如此用上的。

但问题在于，数学不过是主观产物，其对错根本就不可能用客观手段去验证，只能用思维的规律本身亦即逻辑学规律去验证。换言之，无论是逻辑学还是数学都处在人脑的封闭系统内，无法转换切入外界那另外一个系统。它们的验证只能在内部进行，不可能从客观系统引入检验标准，唯一的对错标准就是“逻辑上是否自洽”。于是当遇到内部无法验证的根本问题时，学科就会分叉，根据对无法验证的同一问题的不同假设，可以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数学体系来。尽管基本假设（所谓公设，也就是靠内部验证无法证明的基本问题）完全不同，据此发展出来的理论也完全不同，但只要逻辑自洽，便都是正确的。此所以数学乃天下最滑稽的学科，完全符合庄子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

例如平面几何大家都学过，它建立在几个不可证明的公设上。其中有个所谓“第五公设”，也就是我们在初二学的平行线判定定理之一：“若两线之同旁内角和等于 180° 度，则两线平行”。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想用反证法证明这条公设，把它变成定理，于是便作了相反假设，以此作为推导前提，试图推出与前提相矛盾的结论来，但他推出了几十个定理，都毫无逻辑错误。至此，罗便意识到第五公设其实不可证明，而他其实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几何学，于是便把那工作进行下去并完善了它，是为所谓“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这套东西和我们熟悉的欧几里德几何完全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逻辑自洽的，所以两者都是正确的，在物理学上也竟然各有各的用处。

当然，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同，其理论可以用实验去验证，但这并不能真证明我们感知的世界真就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面已经说过，数学不过是逻辑在数量中的运用，而物理学又是数学在物理运动中的运用，因此说到底还是以主观观念去梳理客观外界。所以，自然科学并不如朴素的唯物主义大老粗设想的那样坚若磐石，基础其实是悬在半空中的。

由此可知，整个自然科学就是老康说的那样，是人类用理性（reason，又译“知性”）去为自然立法，而所谓理性其实也就是人类固有的那套思维规则，建立科学理论靠的是这套规则，检验科学理论首先使用的也是这套规则。如果一种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它就根本连提都无法提出来。反过来，如果一种理论在逻辑上自洽，那它无论与既有理论如何抵触，甚至被实证证伪，它也可以是始终无法真正驳倒的怪论，芝诺悖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附带说明，我只将比喻使用于通俗解释，不像高手们那样用它来代替论证），人类其实是透过有色眼镜去看外界的，但咱们非但永远不可能摘下那眼镜来，甚至无法确知它到底是否存在。因此，客观外界是否真是我们看见的那个样子，乃是人类永远无法查知的奥秘。

三、康老的辩证法

“辩证法”（*dialectic*）这个词乃是柏拉图创造的，原意是通过辩论进行推理论证，可见此词的中文译者（日本译者？）很有西学素养。老柏写了若干“对话录”，都是以他师父苏格拉底的名义与人对话，很像后来法庭上的律师（或检查官）盘问证人。那方法乃是先扮演甲方提出一个大众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再扮演乙方搜剔破绽，发现隐藏着的思维错误，从而推翻错误前提，修改原理论，深化认识。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思维方法，可以由思考者独自进行。我自己就常这么干。

到了中世纪，这个词其实和“逻辑”（*logic*）同义。到了康老先生那里，它才获得了新的涵义。

康德认为，正因为人类只能使用主观固有的那套思维框架去穿凿客观世界，一旦超出了这个框架，则人类必然不知所措，这就是孙大圣用金箍棒给人类理性划的那个圈，咱们再怎么折腾也无法突出重围。

说具体点吧。前面已经讲过，人类认识客观外界的基本假设，是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由一套规律支配，而这套规律和咱们使用的思考规律原则上相一致。所以，人类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必须符合逻辑学规律，一旦违反了那些规律，人类便只能视为错误，否则便只能否定逻辑学规律，但一旦否定逻辑学，则人类也就丧失了思考的可能。

在一般情况下，逻辑思维恢恢乎游刃有余，不会遇到上述难题，但一旦人类试图深入形而上学（*metaphysics*）领域，去思考那些根本问题（*think the whole*），不可解决的难题就来了。例如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就是如此。使用逻辑思维，可以导出“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宇宙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宇宙在时间上有始有终”等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些结论的导出在逻辑上并无矛盾，按理根本不该出现，于是便暴露了逻辑思维的固有局限。

康德将其这种互相否定的命题称为“二律背反”（*antinomy*），并给出了四类二律背反，把正命题（如“空间是有限的”）称为“正题”（*thesis*），反命题（如“空间是无限的”）称为“反题”（*antithesis*）。他认为，两者之间不是传统逻辑学上的矛盾，而是一种特殊矛盾。他把传统逻辑学上的矛盾称为“分析”的（*analytical*）矛盾，把二律背反这种特殊矛盾成为“辩证的”（*dialectical*）矛盾。至此，“辩证法”（*dialectic*）到了老康手上，才获得了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世纪都不具备的现代涵义。

不难看出，康老所谓“分析的矛盾”指的是思维错误导致的矛盾，因而可以消除，而“辩证的矛盾”则是指思维无错误的内在矛盾，它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理性固有的局限，因而无法消

除。

因此，尽管康德首先指出了不同于传统理解的逻辑矛盾的“辩证矛盾”的存在，但他对所谓辩证逻辑持的是其实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辩证矛盾出现之处，也就是理性的止步点，那不是后世马教信徒认为的更高等的新思维方式的开始，而是理性思维（reason）的天尽头。跨出那界限去，人类便只能彻底迷失在混沌之中。

四、黑格尔的辩证法

如果说老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老黑就是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哲学家。其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有什么了不得，而是因为他的弟子马恩列斯毛卡（斯特罗）波（尔布特）改写了人类历史，或更准确地说，是写出了一部空前的人类灾难史。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尼采可以与他分庭抗礼。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说什么“哲学家们只关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倒有三分道理。不过更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哲学家们最恰当的去处乃是图书馆，而人类可以想象的最大噩梦，就是哲学家来做皇帝并试图用他的体系改造世界。”

西方哲学界有所谓“大陆学派”和“英美学派”之分。我个人认为，这分歧乃是在康德以后才出现的，具体来说就是自老黑始。和英美哲学家们注重分析不同（所谓“逻辑分析学派”一直是英美哲学主流），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人害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病”，那就是酷爱大而无当的综合法，动辄推出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来，把全宇宙统统装进他们那个乾坤一气袋里去，老黑尤其如此。这一套最为脚踏实地的英美哲学家反感。黑格尔在英美似乎从没享受过在其他地方享受到的声誉，波普更对他口诛笔伐（尽管他原来也是个德国鬼子）。

老黑之所以酷爱“高屋建瓴”地综合，大概和他不懂科学分不开。康德和他完全不同，乃是个通才，数理化全懂，除了教授哲学外还教授自然科学，他推出的猜测宇宙起源的星云学说在当时很有影响，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老黑则是个大无畏的科盲，这种同志去玩哲学，势必要推出个大而无当的伟大体系来。

用鬼子的话来说，老黑的书乃是 the most impenetrable，也就是最难懂的，有人还怀疑他其实是玩网上常见的哲人那一套，以玄奥不可解的废话冒充深刻渊博。那倒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当年小芦看什么《小逻辑》当真是汗流浹背，最后弄到尺子与颜色铅笔同上，先把句子成分用不同颜色铅笔标记出来，再琢磨其中的联系，常常一天也看不了一页，到现在那些鸟书说什么统忘记了，只留下一点模糊大意。

老黑出类拔萃的空前想象力，成全了他害的“体系病”。在他之前，哲学都被看成是个别的学说或主张，历史都被看成个别偶然事件的随机集合。把哲学看成是科学那样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学科，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变化的有规律的必然过程，乃自老黑始。不管这说道是否符合真实，能想出它来，这思维能力的确是空前的，怪不得老黑要风靡了整整一代浅薄知青们。

大陆人从小在“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的屁话中长大，可能无从理解我这话的意思，更

无从想象古人并没有什么“历史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古人，在老黑之前都把历史看成是一堆偶然事件的集合，从未想到过它也可以是如同地球绕太阳旋转那样，乃是由冥冥之中的某种“客观规律”事先决定的一个必然过程。马列这套屁话，其实始出于老黑，此前并没谁发过这种梦呓。

在老黑看来，世界的本质，乃是一个无所不包、统一了万事万物的“绝对精神”（德文是 **Geist**，具有英文 **spirit** 和 **mind** 双重涵义，因此英文译本或在具体段落中使用相应涵义，或用大写的 **Mind** 翻译并特地加注说明）。不但所有的个别的“精神”（也就是“脑袋”吧）是它的化身，就连大千世界也是它的物化。老黑认为，他这理论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而是统一了所有哲学流派在内的绝对体系。

据我记忆所及，因为不懂科学，老黑主要把他那“绝对精神”用在社会历史和哲学领域里。

在他眼中，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随机的，偶然的，没有规律的，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就是“绝对精神”发现并实现自己，从而获得自由的过程。黑格尔观察到，人类早期没有什么个人自由一说，也没有个体思想自由，在古代中国，人们从来认为思考乃是统治者的权力（老黑毕竟是雾里看花，其实应该是圣人的权力而不是君王的权力），个体没有这种权利。如果告诉人民他们也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就会骇而却走。但到后来这绝对精神就开始觉醒而实现自己，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精神（或脑袋）追求自由的表现。但因为它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反对面，因此必然过火，要“走向反面”，制造出残暴血腥的恐怖统治来，反倒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原来那点自由。于是这又否定了自身，最后对立面与之相拮抗，就上升到一个高级阶段，使得自由最终得到实现。

伦理学也走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登天途径”。老黑认为，古希腊人生活在一种理智与感情统一的和谐状态之中，但这种和谐乃是原始朴素的，因为个体的良心不能超越社会共识而存在，所以为了自由能得到发展，这和谐必须打破，于是就来了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指的是基督教抗罗宗的出现，在德国是路德教派），强调个人的“良心权”（其实是强调个体可以自行改造升入天堂，用不着教会代庖，更用不着由教廷垄断）。但如此一来便造成了良心和利欲、理智与感情的分离，所以还需要“否定之否定”，到达更高阶段，在那个阶段中，所有的人的既有古希腊式的整体和谐，又有个体的充分良心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使得人类终于实现义与利、理智与感情、个体充分自由和集体自由的高度和谐统一。

哲学上也有所谓否定之否定。在那个时代，“逻辑学”和“哲学”这两个词常常混用（其实现在也如此，例如英美学派就把他们的哲学称为逻辑学），在《逻辑科学》中，老黑把形式逻辑称为“普通逻辑”，把他发明出来的大堆屁话视为更高一等的“辩证逻辑”，这就是马教贬低形式逻辑的反智主义的由来。

前文已经说过，康德把推理错误导致的可以消除的矛盾称为“分析的矛盾”，把理性局限导致的不可消除的矛盾称为“辩证的矛盾”。这儿的分界很清楚：人类的理性只容许他们解决前一类矛盾，而解决后一类矛盾则超出人类的认识能力。

老黑对此不以为然，大批了一通康德。他认为矛盾乃是人类思维的内在的必然特点，并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理性的局限。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不过是脑袋（也就是那个“精神”）

的外化，这精神如同孙大圣的分身法，化为各种理念以及物体，在这过程中，精神与自身异化了（alienation），但因为精神认识自己 乃是必然规律，所以最后两者必然达到和谐统一，再度结婚，在毛主席领导下过上非常海皮的日子。

这是从总体而言，具体来说，人类认识必然是充满了矛盾的，理念都由互相否定的两方面组成（也就是所谓正题与反题），正题先出现，但它本身就含有否定自身的 那一面，于是又由反题取代，最后两者统一，成了更高一级的和谐的“合题”。用抽象的哲学行话说，事物出现是 being（存在），后来是 negation（否定），这过程最后便是 becoming（形成）。

就是基于这些大而无当的完全归纳，老黑才认为哲学并不是分散的各派学说的集合，那不过是“精神”在找到自己前的各种外化罢了，都在不同侧面代表了自己。现在精神通过他老黑找到了自己，于是所有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就此整合在他的大旗下，从此变成一门完整的统一的科学。

历史也是如此，它不再是分散偶然事件的杂乱集合，而是“精神”寻找自己的必然过程。而人类社会一定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当那“超级脑袋”（Mind）最终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便能实现权利与责任、自由与义务、贪欲与良知的高度和谐，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自由。

不管是否信教，骨子里个个是唯物论者的大陆人可能无法接受那“超级大脑袋”的屁话，但应该由此看出马教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是老黑首倡的：1）必然论。历史 乃是一个必然过程。2）革命乐观主义。人类社会的前景一定是一个光明的理想境界。3）空想主义。在黑格尔看来，只要个体认识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就能最终 解决“利”与“义”的矛盾，达到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高度统一的和谐境界。如波普指出，这和卢梭“强迫人民自由”一样，乃是后世“无产阶级独裁”的血腥统治 的理论起源。

现代人应该看出老黑这些屁话确有一定道理，他正确地看到了人类固有的一些冲突诸如权利与义务，良知与贪欲，以及人权意识在西方的逐渐觉醒等等，但他从个别 事实便飞跃到囊括全宇宙的完全归纳命题上去，整个理论根本就缺乏起码的根据。例如那命中注定要发现自己的“超级脑袋”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华大地，直到今天也 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原来独立思考不是政府专利而是自己的天赋人权。如果鬼子不打进来，咱们便再过一万年也不知道这条。

西方历史似乎也不是他说的那样，法兰西大革命并不是人类自由意识觉醒的里程碑，早在此前美国人便写出了《独立宣言》，明确界定了人类的基本权利。而且，要 让超级大脑袋觉醒，找到自己，实现自由，似乎也用不着遵循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的教导：“执行政策就像开飞机，左一下右一下地来”，采用法国那种 血淋淋的“否定”方式，英美道路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反证。

伦理学的“螺旋登天记”更是笑话一则。难道古希腊就没有义和利的冲突？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那莫非也是理智与感情和谐的表现？一部人类史，就是每页都写满 “贪欲”的流血史。即使只考虑思想自由，老黑也忽略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他心目中的“三级跳”根本不成立，正确地说应该是自由的希腊被不自由的中世纪否 定，而中世纪又被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人性觉醒所否定。但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义和利的冲突将永远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他设想的和谐天堂。

他的哲学观我看也是胡说八道，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系，哲学和宗教就是如此。自然科学从来没有五花八门的宗派与掌门人，而哲学和宗教的宗派则越来越多，与时俱进。这原因老康早就说过了，它们探索的是理性到此止步的形而上领域，因此必然是公婆各有理，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任什么超级大脑袋也不可能整合之，就连斯大林、毛泽东那些杀人魔王都没这本事，何况是老黑那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儒？

（附注：这儿的“超级大脑袋”——Mind 乃是搞笑，读者不可认真。老黑的“绝对精神”乃是一种超越时空存在的抽象的哲学理念，它其实由世间万事万物包括所有的个体的脑袋组成。）

五、马恩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之深，似乎远远超出了共党国家宣传机器愿意承认的那点，或许这不利于伟大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吧。但从上面的简介中，颖悟的读者应该立即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框架就是老黑的必然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空想主义那几条。尽管内容不同，马克思看问题的定式完全是老黑给他的。

据恩格斯总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后者与黑格尔无关，前者其实就是老黑那套视角换了个观察对象：人类历史乃是由某个冥冥之中的客观规律支配的必然过程，不过，那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寻找实现自身的绝对精神，而是不顾一切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依次出现，最后实现螺旋式三级登天：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进入毛主席领导下的非常非常海屁的人间天堂。

马克思和老黑一样，似乎不怎么懂科学，强过老黑的就是数学不错。所以无论是老黑还是他，都没有把那些辩证屁话扩散到自然科学领域里去。偏偏恩格斯那中学知青自以为懂科学，写了《反杜林论》，首开用辩证法污染自然科学的滥觞，端的是造孽无穷。

老恩那些胡话，我已经在旧作里批驳过了，不拟在此重复，只想告诉那些以举例反驳我的同志们一点起码常识：辩证法乃是最普遍、最完全的归纳，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套了进去，所以，只要有一事一物不符合它，则那规律就只能扔进茅房去。诸位若想挽救它，起码得准确界定所用概念，并确定它的成立条件，以证明它虽然不能支配万事万物，但毕竟在某些条件下成立。

六、毛泽东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辩证法与其前驱有两个区别：第一，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只是学者们解释世界的一种理论，而毛泽东的辩证法则是用来规范全民、改造世界的国教；第二，黑马恩的辩证法算是一种学问，有一定学术价值，而毛的辩证法则是政客赖以生存的流氓手段，毫无学术性可言。

要明白这点，就得明白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变成宗教，又为何会堕落为流氓手段。

国内中学政治课教材上给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反正我当初学的定义是这个。这话大致不错，只是太模糊。哲学所谓“世界”，不是地理学的世界，其实就是宇宙，而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一切存在乃至整个宇宙的本质的解释，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think the whole”，也就是把存在当成个统一体系，去思索它的本质。

如上所述，这些领域本来是处在人类理性范围之外，去思索它就必然要得出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处在人类认识能力之外，这些主张根本就无法验证，无所谓对错可言。例如有神论和无神论都是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但谁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

因此，哲学的所谓“学术价值”，其实是美学价值，不是科学价值，只在于思维的精妙复杂度，不存在什么错误正确问题。我本人喜欢唯心论，一方面是它投合我的天生气质，另一方面则是它比较符合我的审美品味。在我看来，只有悟性比较高、思维比较复杂深邃、感受比较细腻敏锐的同志才会想出那些复杂精巧深刻的说道来，而朴素迟钝麻木浅薄的大老粗的直线脑袋则天生倾向于一眼到底的唯物论。

但这比较只是美学意义上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并不能因为唯心论的景德镇瓷器比唯物论的土大碗更精美，就认为前者正确后者错误，正如谁也不能说李白杜甫的诗是正确的，小靳庄赛诗会的顺口溜是错误的；只有林妹妹宝姐姐才是女的，使男子如卧绵上的鲍二家的就不是女人一般。

所以，哲学家们的本份，就是满足于解释世界本质，乖乖呆在美术馆的观赏架上，供闲人玩赏品评。如果有哪位哲学家不甘寂寞，以为自己发现了“宇宙运行规律”，要来侵入科学领域，那就必然要失去原来的超脱性质，变成世俗谬误。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误：用真伪无从裁判的某种理论去判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正误，甚至狂妄到自称那是压倒逻辑思维、可以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高等思维方式，最后的结果就必然是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再现人间。

再讲明白点：所谓世界观，乃是人们对世界本质的大而无当、不可验证的猜测，因而根本没有指导人类实践的作用，更没有预见能力。例如“上帝存在”（或不存在）这种信念对人世活动毫无指导意义，相信上帝存在（或不存在）或许会让你活得更踏实，改变你的人生态度，但绝不会使你获得某种大智慧甚至预见能力。“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之类P话也如此。

因此，哲学对人类实践毫无指导意义，不能使人变得更聪明，更不能保证人类作出明智决策。如果哲学家认识不到这点，忘记了他的身份，试图用他的理论来“干预生活”，如黑格尔马克思那样预言人类社会走向，如恩格斯那样充当“科学教父”，那就是用形而上学冒充实证科学，以 prophecy（宗教预言）冒充 prediction（科学预言），哲学也就必然堕落为伪科学，而这就是从老黑到老毛发生的一连串堕落：从哲学到伪科学，再到邪教神学，最后堕为流氓生存学或曰厚黑学。

毛及其前驱的伟大贡献在于，哲学到了他们手上，才真正成了一门“预测科学”。科学的特点是有预见能力，例如天文学能准确预见日月蚀发生，这种预言构成了科学的验证手段。哲学既然要假扮科学，当然也就必须作出预言。一旦走到这一步，它也就失去了形而上学的超脱

地位，变成了可以验证的世俗学科，证伪手段就是那预言。此乃一切骗子的共同难题。骗子高明与否也就全看其如何应对。一度光顾此坛的明心大仙乃是低档货，弄出个连白痴都能验证的“2005年3月瘟疫席卷中国大陆”的预言来，实行“曲线倒法”，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辩证法之美，就在于它绝对不会处于这种难堪境地。如我在另文所述，在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以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著称，在他生前，学生们对他的“合理即存在，存在即合理”就分裂为两大派，聚讼不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更是深得其神髓。如我在批判“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文字中指出的那样，那些“规律”使用的中心概念诸如“量变”、“质变”，“否定”等等，没有一个可以准确界定，任你怎么理解都行。这就使得它获得了一种“百分之百正确，绝对不会错”的特殊品质，随着这品质而来的，就是事前毫无预见能力，事后解释头头是道。

举个简单例子吧：“明天有可能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这句话的真理含量为百分之百，永远不会错，但信息熵为无穷大，因为它毫无确定性，等于什么都没说。说这种话的唯一好处，是使论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事后无论是否下雨，都可以振振有词：“我昨天不是早说了么，今天有可能下雨（或不下雨）？”

请诸位去看看艾思奇那本破书上介绍的“辩证逻辑”是不是这种屁话。就拿那“偶然是必然的表现”来说吧。所谓“偶然”，应该是“事件发生概率小于1”，所谓“必然”则应该是“事件发生概率等于1”，概率越小，则偶然性越高。

现在有人从纽约帝国大厦顶上跳下去，根据常识可以预言，他摔死的概率等于1，所以是必然的。但此时突然从地上升起了个大气球，他一把攥住了，平安落地。谁都知道，这完全是偶然事件，可以说是一种神迹。在此特例上，偶然不过是一种不可预期的好事，所谓“可遇不可求”，它的发生打破了必然，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必然表现，鼓动大家去跳楼。

这就是正常人的偶然与必然观，赌鬼们不具备这种常识，因为自己偶然赢了一把，就以为那是必然表现，最后倾家荡产。这种做法，与中共把自身的偶然成功当成必然规律去亚非拉输出革命，在本质上毫无二致。

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跳楼不死虽然是偶然事件，但也是必然事件，那人之所以获救，乃是气球具有浮力的阿基米德定律决定的。所以，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反过来，如果那人没遇上那好事，或是没有抓住气球，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振振有词：他摔死是偶然的——那么多人都不自杀或是采取别种方式自杀，只有他在某个特定时间去某个特定建筑物上跳楼，当然是偶然的，如果是失手没抓住气球那就更是偶然了——但也是必然的，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决定了位能转化成的动能必然让他粉身碎骨。所以，偶然是必然的表现。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必然过程。所以，无论纳粹上台还是中共上台，都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其实是必然的表现。前者乃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必然表现，后者则是革命人民必定胜利的必然表现。说到最后，世上就再没有什么偶然事件了，凡是发生了的都是必然的。

这当然是真理，谁也颠扑不破。您想反驳，就得把历史倒回去，证明纳粹和中共上台乃是一

系列因缘凑巧的结果，完全可以不发生，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可您有本事这么做么？

有趣的是，我在谈波普的文字中以此为例说明什么是伪科学，那文字也贴到了《彩虹之约》，某位网友竟然以为我不懂概率论，向我宣讲了一番概率论的A B C。我记得那似乎也写在艾思奇那破书上。我这儿再说得明白点，希望他这次能看懂。

例如打六合彩吧，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否有人打中，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某人打中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因为概率决定了一定会有个别人打中；其他人没打中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因为概率决定了大多数人都不会打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打中，那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因为那是小概率事件，概率并不一定等于频率而是频率的极限。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证明了偶然是必然的表现。

您说这难道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难道又不是百分之百的废话？它预见到了什么具体结果？增加了您的什么知识或甚至智慧？

这种百分之百的真理，使得无产阶级政治家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须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与传统帝王有个重大区别。两者都是受命于天，但上天授命的方式有个根本区别。它授命给帝王，是因为帝王是它儿子，属于私产授受，那当然谁也无法与之竞争，而无产阶级领袖则缺乏这种私相授受的优越性。他们之所以当皇帝，不是老天爷把家私交给了儿子，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真理。

这就给现代帝王带来了个极大难题。传统帝王不必永远正确，犯错误并不能使他丧失与上天的血缘关系，所以他再下一万份罪己诏，也决不会影响其权威甚至动摇其统治。但现代帝王绝对不能犯错，否则立即便不再是真理化身了。这就是为何彭德怀那无比委婉的意见书竟然引来伟大领袖如此狠辣的惩罚，而且毛在饿死了几千万人后仍然坚决拒绝认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择恶固执、最能巧言伪说文过饰非的君主，这在他其实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同理，只要我党执政一天，文过饰非、死不认错就必然是它特别是党魁的特点。

这种特殊难题，使得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定要变成表里不一的两元论者：在具体考虑战略战术时，他们用的一定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逻辑思维，绝无可能使用毫无实用可能的“辩证思维”。斯大林那战略大师生前的一系列决策都是老一辈帝国主义战略家使用的那一套，丝毫没有有什么“新思维”的痕迹。这套玩意当然会出错，例如他估计德国只会在对英战事结束后才会挥戈东向、估计美国不会介入韩战都是这种错误，但那只不过是因他对对手缺乏了解所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辩证法。但对外宣传就必须使用辩证思维的包装。在后面这点上，他可是远远不及咱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无论是作为治国的国务家，还是作为政治战略家，毛的才能都不如斯大林的一个脚趾甲，大概他对此也心中有数，只需看他访问苏联时毕恭毕敬地请教斯大林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就足可看出这点来。那谈话记录使我吃惊的是，老斯发表的预言丝毫没用辩证法包装，而且说得确定性相当大，与毛泽东惯用的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预言方式截然不同。可见论懂辩证法的妙用，他还真不如毛泽东。

毛泽东平生唯一的高明之处，就是看出了日本侵华是他趁机发家的天赐良机。看出这点可不是靠什么辩证法，而是24史中存储的阴谋诡计，那说到底还是不自觉地使用形式逻辑。毛

真正将辩证法应用得炉火纯青之时，乃是在内部下指示或公开发表讲话之时。

毛的“哲学论述”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写成的四篇“哲学论文”，另一部分则是他在讲话或批示中演示他怎么应用辩证法。前一部分我已经在旧作中分析过，此处不再重复，只说一下他的具体运用。

毛的所谓“哲学思想”，其核心就是所谓“两分法”或曰“两点论”，它与黑马恩的辩证法只是皮相上的相似，更像道家的相对主义，但无论是黑格尔，是马恩，还是道家，强调的都是“对立统一”，通过对立面互相否定，相反相成，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而毛的辩证法则“对立消灭”，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根本没 有什么“统一”可言。

“一分为二”，斗倒斗垮斗死斗臭敌人是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两点论”则是他的方法论。毛特别强调“两种倾向”，说如果只看到一种倾向，那就是一点论，就是片面性，就是“形而上学”（毛使用的“形而上学”不是哲学界的通用涵义，指的是所谓“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因此，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两个方面，充分分析事物的两种倾向。

什么是两种倾向呢？那就是上文说的“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会下雨”，这就叫全面，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用这两点论去分析世上一切事物，那就绝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可以预言，什么都可以证明。

先说预言。您说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这无非是两种结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永无宁日，所以战争一定会爆发。但另一方面，人民革命力量代表着历史潮流，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也决不会让帝国主义横行。所以全面地看，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管是哪种可能，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人民一定胜利。

您说这预言准确不准确？迄今为止世界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伟大领袖的光辉指示，强大的革命力量一直制止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您说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发动战争？具体来说，您说如果我们去解放南朝鲜，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介入？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可能知道他们怎么想。但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看，那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人民的力量使得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二是帝国主义错误估计局势跳出来。即使是后者也不是坏事，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坏事会变成好事。如果帝国主义跳出来，也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

再说证明。

求证 1：超级军事大国美国其实是纸老虎。

证明：美国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点东西，搞了几千万吨钢（按：原话是说苏联，此处借用），

就到处欺负全世界人民，到处派军队，搞了那么多军事基地。这迟早要走向反面。它搞的军事基地越多，套在脖子上的绞索也就越多，只能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加速灭亡。

求证 2：中国贫穷、文盲众多是大好事。

证明：“一穷二白”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文盲多则使得中国成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欧洲人均肉食量远远高于中国是坏事，因为“肉食者鄙”（按：关于中国欧洲肉食量的比较与评论出自毛的内部讲话）。

求证 3：大饥荒是大好事。

证明：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大跃进是中国农村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波澜壮阔的三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就是九个指头。当然，这么大的一场革命运动，不付出点学费又怎么可能呢？不要只看见死了几个人，天是不会塌下来，地球也是不会停止转动！只有阶级敌人才会抓住局部的一时的困难大作文章，一笔抹煞光明面。

至此同志们应该明白毛的辩证法是怎么回事了吧？用敬爱的林副统帅的话来说，“辩证法就是变化法”，其实也就是无耻诡辩法。它的精髓就在于这“两点论”，用它可以为自己的一切罪行辩护，丑化一切自己想丑化的人。什么都能“走向反面”：美国可以变成纸老虎，东亚病夫可以变成世界革命中心；黑的可以是白的，白的可以是黑的；滔天大罪可以变成丰功伟绩，丰功伟业可以变成滔天大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那“九个指头”属于谁。民间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就是许多国人心目中的“高级思维方式”。它之所以高级，乃是因为国民太低级。而这才是真正令人心碎之处。

七、“辩证思维”流行造成的民族灾难

如上所述，所谓“辩证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1）“绝对真理”，亦即不含任何信息、毫无意义的废话。2）诡辩，亦即违反同一律，对所用概念故意不加界定，使它们变得灵活到不可捉摸，随便怎么理解都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任意改变概念的内涵，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

很明显，推广这套东西，势必彻底摧毁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前面已经说过，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就是形式逻辑。不遵守这套“交通规则”，头脑中的各种模糊概念就只会纷至沓来，杂乱无章，永远也理不出个脉络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条的思想体系。

这说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创建，消极意义又何尝不如此？逻辑证伪不但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标准，也是哲学和其他无法用实证证伪的学科的唯一证伪标准，而且还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第一道证伪标准。前文已经说过，如果一种科学理论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那它就连提都无法提出来。人类的假定是支配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类思维所用的规则一致，离开这套规则，

根本也就无法构建出大众认可的理论来。

逻辑思维决不限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建立理论体系，对我辈庸人也同样重要。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自觉使用逻辑思维能“倍增”人的原始天资，使得你比具有相同智商的人“聪明”得多。福尔摩斯之所以能侦破别人破不了的案，全靠他把逻辑推理应用得炉火纯青。这在所有的行业其实都一样，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例如史学研究、考古研究等等）使用的全是这一套。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科学家侦破客观世界奥秘，和大侦探侦破案件的过程并无不同。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养成了自觉使用逻辑思维的习惯，能让你及时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破绽，不至于如高手马悲鸣、林思云、樊弓等人一样，大无畏大无谓大无伪地在天下面前爆笑出丑。同理，逻辑思维习惯能使你具有起码的辨伪能力，无论听到什么谣传都能瞬间内初步判断其可靠性，此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看书时更能有独立批判能力，不至于让人轻易洗脑。

这是从个体来说，从群体来看更是如此。思想交流要有可能，就必须先“统一度量衡”，把彼此使用的概念规范化，这才能让对方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通过争论或讨论或者达成共识，或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显示的那样，双方准确辩诘，暴露原先忽略了的思维错误，最后深化双方的认识。否则必是鸡同鸭讲，徒然浪费时间。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度量衡”统一了，尺度标准是一个，你若想捣鬼改口也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所以西方的法律文书所用术语都界定得极度严密精确，就连个买房子的合同，都繁复到让人看得睡意如潮。

不幸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居然谁也没想到这点。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争相拍卖自己，贬斥对方，可一直是鸡同鸭讲的乱哄哄的骡马大会，各家自带“尺子”、“升斗”、“秤砣”，不但和别人的不一样，就连自己使用时也是弹性无穷，当真是一片乌烟瘴气。直到战国时代行将结束，才出了荀子韩非师徒，开始注意到这问题，可惜大一统马上又来了，中国人从此失去智力进一步发育的机会凡两千多年。

这当然不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就没人会逻辑思维。如上所述，逻辑本是人脑固有属性，本该是先天就有的。古代聪明人的问题，是他们从来不去研究思维本身的规律，所以只会不自觉地使用这套思维方式，却从来想不到把它总结出来向全民推广，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此，古籍中就只能偶见白乌鸦，其思维之严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从未形成学术传统。

更奇怪的是，古人使用逻辑思维的领域很窄，多半用于政治军事权谋，在这方面可谓出类拔萃。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智多星”的战略筹划中，基本上找不到逻辑错误。其次就是用于分析人情世态。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李渔在《肉蒲团》中，以太监并不比常人健康长寿来证明“女色无害论”，用的其实就是逻辑学上的反证法（亦即归谬法），且与科研常用的控制对照实验原理暗合。更精彩的例子可从明代冯梦龙所著《情史》中找到。再其次就是用于学术考证，优秀范例是裴松之使用逻辑思维对史料进行严谨辨伪，这我也在旧作中介绍过了。反倒是越是所谓“思想家”，越发不会使用逻辑思维，以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体系的理论。自老子以下，除了荀子师徒等个别例外，所有的大家们都是“天马行空”、“法无定法”，逻辑错误一抓一大把。

中国人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传统何来，我已经在旧作中约略说过了：拥挤社会的紧迫需要对居民的思维方向作了“加权选择”，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向与古希腊人的完全不同，研究

人际关系的学问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学问，权谋术成了优选出来的强项，而与尘世无关的抽象思维能力便萎缩了。不但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就连数学和逻辑学也没能在中国诞生。古代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最重视的文科，也因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不但一直没有建立合理的文字注音系统，导致“音韵学”这种冗赘之学因愚蠢而产生，而且竟然连语言需要“法律”来规范这点都不曾意识到，以致中文成了最没有规范性的一种语言。海外有人说，中文只有好坏之差，没有对错之别。这话再准确地不过地指出了它只是一种艺术语言而非学术语言。

这和西方可完全是两回事，哪怕是首倡“辩证思维”的黑格尔，其著作中也找不到中国思想家们著作中那些耀眼夺目的逻辑错误。尽管他的理论颇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之处，但基本理论如“绝对精神发现自己”的“三部曲”还是一以贯之的，在历史、哲学、伦理等领域都根据同一思路用上了。相比之下，同样鼓吹“辩证法”（其实是相对主义）的战国诸子中最有才气的庄子，其主要学说本身就是个逻辑笑话：他的自由观本是抹煞世俗成败之别的，可他最爱讲的却是“小大之别”！如果说跨时代不便比较，那古希腊大家的著作也从未见过类似错误。

这就是海禁初开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很明显，要追赶西方，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素质问题，最大的现代化就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素质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道德素质（含人文修养，公民觉悟等等）与智力素质。可悲的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这问题。哪怕是智者也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国民智力素质的惊人低下，而这主要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悠久传统造成的。在中共执政前，这缺了的重要一课一直没能补上。

等到大老粗痞子党上台，就给全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我党代表着中国传统最反动没落腐朽的那部分，其强力推行的邪教自然也就因符合中国国情民俗而获得强大生机，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五湖四海，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有趣的是，这图景又于今日再度重演——伴随着我党的“去痞子化”的，是代表着腐恶传统的法轮功的勃兴。这说明一个民族要摆脱传统是何等艰难，更证明黑格尔所谓“历史会学习自己，因而不会重演”的說道是何等可笑。

我党改造全民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得原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传统的国民特别是49年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失去了建立合理思维方式的可能，制造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之邦。不仅如此，它更在伪知识分子们之中培育出一种无知无畏的大老粗轻狂气概，使得他们不仅没发现自己缺了某个最重要的训练，反而动辄便以自己那高人一等的“辩证思维”，居高临下地傲视 somehow 逃脱我党摧残、建立了合理思维方式的少数幸运儿。

这结果，便是不但制造出漫山遍野的网上白吃，而且造出了一种西方绝对见不到的奇观：本来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工科学人，却没有通过专业学习训练出普适的逻辑思维能力来，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他们擅长的所谓“理工思维”出来爆笑出丑，闹出来的智力笑话之匪夷所思，竟与赢得的如雷彩声难分轩轻。我不知道方今之世还有哪个民族，有着这种令人心碎的红色幽默。

为什么大老粗痞子党摧毁全民智力的“改造世界观”会如此成功？为什么所谓“高级思维方式”辩证法的底细竟然没有多少人看穿？我想，这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在《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的浆糊桶里打了足足两千多年的滚，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模糊混乱思维。毛共辩证法那种典型的错乱思维深符国情民俗，当然要甚嚣尘上。

其次是儒家积极反智主义的影响。宋儒搞“百科等级制”，把学科分成贵贱殊途的“大学”、“小学”、“异端邪说”等三大部类，只有“修齐治平”的“大学”才是金光大道，掌握了便一通百通。这种“纲式思维定式”在毛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辩证法作为官定意识形态，取代圣贤之道成为“万王之王”，完全符合咱们的传统。

第三则是我党猛批所谓“形而上学”，压制逻辑学教育，使得学生成了毫无选择可能的井底之蛙。如果不是 50 年代出版了点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我就绝对没有课外学习逻辑学的机遇。到后来，就连苏联出的书也成了“封资修黑货”。学生最好的前途当然也就只能是如同老前辈裴松之、冯梦龙、李渔那样，不自觉地运用天生的那点逻辑思维能力。可惜自觉使用与本能使用完全是两回事，天生的飞毛腿若不接受专业训练，就绝无可能把全部潜能发挥出来。

第四个原因乃是国人如同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个“套中人”一样，酷爱“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类永恒真理，一见到“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之类废话，当然要如群兽乍闻《韶乐》，心花怒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毕再拜曰：“圣哉！”

下面针对我党制造的典型混乱拨乱反正。

1) “强调逻辑思维会使人堕入“形而上学”泥坑，诱导人们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看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并忽略事物之间的彼此影响。”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乃是永恒真理，除了巴门尼德师徒外，从来没谁否认这条。但这不过是废话一句，根本无法用在事物的考察研究之中。

我在旧作中讲过，人类只可能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逐个研究事物，这恰恰是人类的抽象能力所在。物理学的“质点”、“刚体”、数学的“点线面体”等概念，完全是人为捏造出来的，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问题简化到有研究的可能。类似地，化学里的纯净的单质、化合物等根本就不存在于天然世界。要研究它们，先得人为制造一个“静止、孤立、片面”的条件，把要研究的物质和其他杂质分开，这就叫“提纯”。不完成这一步，研究物质的化学性质就是句空话——你怎么知道发现的性质不是杂质的？生物学也同样如此。例如细胞分裂，乃是典型的运动变化过程。要知道它是怎么进行的，就先得把活组织“孤立静止凝固”下来，弄死切成薄片（还不是立体的，乃是二维的图象），一片片去仔细研究各个阶段的变化，最后再从头到尾拼成完整的图象。

这就是逻辑学上所谓的“分析”与“综合”，它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事物的变化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例如上例中研究细胞分裂，先将那过程拆成一个个静止的画面，逐个研究明白，这就叫“分析”，最后再把全部画面组装起来，这就叫“综合”，经过这两个步骤，人们也才可能掌握在整个过程中细胞发生的运动变化。

这其实和研究世界跳高冠军成功诀窍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不用高速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把动作一个个分解开，再重新组合起来，光是在旁边傻傻地背诵“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的辩证法口号，企图“高屋建瓴”地掌握全过程，那就永远无法明白人家成功的力学原理何在。

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何逻辑学有所谓“同一律”，那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不在思维中把概念固定下来，让它的内涵外延始终不变，而是让它如同猪八戒变成 的鲇鱼一样，在盘丝洞里的美女蜘蛛精们胯下钻来钻去，忽而是 A，忽而是 B，忽而兼有 A B，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想明白任何问题，而这不幸恰是古代思想家们的通病。他们的著作时时可见智慧闪光，可惜游走的概念如同流沙，不可能变成理论大厦的基石。

因此，“静止固定”的逻辑思维方式，乃是人脑对付不断运动变化的外界的唯一利器。这和拍快照乃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把曝光时间缩小，胶片上的运动物体就只能是一片模糊。大老粗文盲党连这常识都没有，这才会因为物体在运动中，就禁止人家用拍静止画面的方式去研究它。

其实我党才真正是“孤立片面静止思考问题”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的“两分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便成了世上最机械、最死板、最僵化的黑白两分法。人性的善恶，竟然以其财产多寡定量划分，多财多恶，少财少恶，无财不恶，成了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而且刻舟求剑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只要在 1949 年以前拥有田产若干，那就再无“改恶从善”可能，只能在人间地狱里煎熬。老邓复出后毅然结束了这由政府向人民犯下的长达 30 年的滔天大罪，竟会在工农大众中激起强烈不满，说明我党对人民心智的败坏到了何等地步。直到今天，黑白两分法还仍然是爱国愤青的强大思想武器，要软化那亿万个花岗岩脑袋，不知还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最可笑的还是“抓纲治国”的“抓牛要抓牛鼻子”的隧道眼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谁“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到了把钢锭当成金条，命令全民放下正当职业不干，如旧金山、阿拉斯加、南非的采金狂一般，日以继夜、如疯似狂地大战钢铁。这就是咱们那不得了、了不得的“高等思维方式”，就是“全面、运动、辩证地看问题”，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全国一盘棋”。论愚蠢的深度、广度与宏大规模，那倒确实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让毛泽东 和他的膜拜者们据此称雄世界，也足以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在坟墓里翻身。

2）“逻辑思维很有局限，并不能准确反映复杂的客观世界”

这话一点也不错。本文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局限，永远也没有可能认识整个世界。在我看来，逻辑思维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在形而上领域里，也就是康德指出的那些“终极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人类认识能力，使用逻辑思维必然会得出互相矛盾的命题，而又无法判明孰是孰非。

其次就是我指出的人类在探索客观规律时采用的那个基本假定，亦即客观世界是由一整套法律（law）支配的，而这套法律恰与人类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法律”一致。这不过是个无法验证的假定，但离开这假定，人类也就没有可能认识客观外界。这儿倒用得着美国实用主义哲

学家杜威（胡适的老师）的话：“有用即真。”为了有用，只好“当真”，把假定当成真的。

不幸的是，现有证据提示，这基本假定并不一定成立，这有两种情形：A）通过正确的逻辑思考得出的结论，明显与直接经验不符。B）某些自然现象不符合逻辑规律。

情形A的例子，就是我在旧作中介绍过的芝诺悖论。那些悖论的特点是，其思维完全正确，推理依据也没有问题，但得出来的结论却与直接经验相反，堪称荒谬绝伦。最典型的就是“飞箭不动”，那推理无懈可击：飞箭要运动，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空间中无限的位点，而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位点没有长度，飞箭在每个位点上都是静止的，无限的静止的集合不可能是运动。这结论被客观世界证伪，却被主观世界判为真，因此永远无法真正驳倒，因为要驳倒它，人先得发现它的推导错在哪里，做不到这点便只会处在永久的困惑之中。这种悖论的存在强烈提示，主客观两界之间的鸿沟大概是无法填平的。

情形B多见于现代物理学发现，人之初网友就曾以此来驳我：

“老芦理论的基础就错得一塌糊涂。如果‘凡不符合逻辑的思维就是错误的思维’，那么统计学就应该是骗子的学说了；量子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不再成立’，就是说按老芦的说法，构成老芦身体的基本粒子都是些错误的东西，一堆骗子加在一起构成了能够正确思维的老芦，这实在是上帝造人以后的第二大奇迹。我虽然也是搞科研的，还不至于成为这样的科学原教旨主义者。”

这整个是逻辑笑话。听他的意思，似乎统计学和量子力学都是正确的思维，但它们不符合逻辑思维。一位搞科研的竟然闹出这种笑话来，本身就说明中国教育制度有严重问题。

其实无论是统计学，是统计物理，还是量子力学，都是使用逻辑思维建立起来的，世上根本就没有不使用逻辑思维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物理学尤其如此。前文早说过，数学就是物理的脊梁，抽去了数学也就没有了物理，而数学推理完全是逻辑推理。离开逻辑思维，谈何创建统计学和量子力学？

他这儿是把“手段”和“结果”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事实是，使用逻辑思维构建起来的量子力学指导下作出的发现，却与逻辑学的规定不相符合，因果律就是这样。

因果关系乃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定式之一。人类所谓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其实就是寻找现象后面的原因。例如经典力学从寻找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开始，而化学则从寻找氧化燃烧的原因开始。“一切现象之后必有原因”乃是人类认识外界的又一基本假定。而这一假定在人类认识的深度广度有限时，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例如物体加速的原因乃是外力作用，反过来，施加外力也必然要引起物体运动状态改变。在此，原因和结果成了一种可以预期的必然关系。

但认识深入到微观世界之后，这一套就再不灵了。量子世界中没有经典的必然因果关系。例如，研究弹子在桌面上的运动属于经典力学。如果把桌面划为两半，只要知道弹子运动的运动方程和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准确预言它何时何地越过界限跑到另一边去。但在粒子世界中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你根本也就无法准确预言那“弹子”会不会越界，只能给出个概率上的估计值来。这就是说，因果关系从原来的“必然”变成了“或然”。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提示了“客观规律并不一定和人类思维固有的规律相符”，这当然令人沮丧，但毫无办法。哪怕未来物理学研究发现光速不是最大速度，因而人类可以从事好莱坞电影上那种“时空旅行”，由此彻底颠覆因果律，使得孩子能出生在母亲之前，咱们还不是只有干瞪眼，并无可能改用别的思维方法来消除主客观之间的矛盾。

第三种局限则是逻辑思维内部的固有缺陷。和上述两种局限不同，它并不是在人类考察外界时暴露的，而是在人脑系统内部验证时出现的。所谓“罗素悖论”就是这种典型例子。

罗素悖论我记得似乎是：“非自含集合的集合到底是自含集合还是非自含集合？”

所谓“非自含集合”，指的是集合内不含有自身。把所有的非自含集集中在一起，就成了“非自含集合的集合”。您说母集到底是自含集合还是非自含集合？都是都不是。子集全是非自含集合，那母集当然也是非自含集合。但母集包含了自身，它也就成了自含集合。这圈子兜来兜去的结果，就是颠覆了排中律。

由上论述可知，逻辑思维的确有严重局限，并不完美，更不是万能的。可惜阿，它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唯一可用的思维工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更好思维方式。所以无论好使不好使都是它了。一般人的谬误，是不知道所谓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乃是同义词，因此在意识到或是听说逻辑思维有局限之后，没有意识到那其实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却以为可以用所谓更高级的“辩证思维”去取代它，这才引出了前述反智主义思潮及其导致的民族灾难。

好在上述三类局限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不会遇到，第一类局限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永恒粮道，我辈非哲人不必操心，后两类则是专供大师们去钻的牛角尖，我辈庸众也犯不上操那些闲心，省得如老芦一般堕为消极的不可知论者。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为全民包括大部分精英疗愚，是普及而不是提高，这样才能避免中国日后再度大规模陷入愚蠢导致的灾难，而大众必须认识到，所谓提倡理性思维，也就是建立逻辑思维的习惯。

说来好笑，中国人对逻辑思维价值的怀疑倒颇像对民主的怀疑，因为民主决非完美制度，于是咱们便否定了它，认为比它糟糕百倍的专制制度反而是好东西。类似地，因为逻辑思维无完美可言，所以咱们就连这人类唯一可用的工具也要扔掉，代之以只能致愚的“辩证思维”。

3) “不懂逻辑照样能进行合理思考，提倡按部就班的逻辑思考反而会限制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话其实也不错，第一句话其实说的是不知逻辑学名词，但会使用它。这其实是西方许多人的实际思维方式，学校里并不开逻辑学课程，科学家们也未必能说出逻辑学术语，数出什么“矛盾律、排中律”来。但那是因为逻辑思维早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再也用不着强调了，正如老会计不懂珠算口诀一般。

可惜中国从无这一传统，孔孟老庄那些连写文章的起承转合都不懂的“大思想家”们不必说，就连现代“高知们”在网上的表现，也在在彰显当务之急乃是使大众先学会背熟那些“口诀”。

第二句话所说的情形，则主要见于大师们通过飞跃式思维作出重大发现。人在思考时，并不一

定循序渐进，如解数学题那样按部就班地来，常常一步就飞跃到了结论，然后再去理清推导过程。

在科学史上，这种事多次发生。牛顿推出微积分时，逻辑破绽很多，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但那玩意就是好使，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高等数学在逻辑上的完善，是通过几代数学家的集体努力完成的。伽罗瓦群论的遭遇更典型，他的论文三次提交给法兰西科学院审查，三次被否定，其理由据说就是因为逻辑不严密。在他死后十多年，其理论才被再发现而且得到肯定。但这些现象只说明，哪怕是大师们也会靠本能使用逻辑思维建立新理论，过后再来完善它的逻辑证明，并不是说可以违反逻辑建立新理论。

其实这儿真正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逻辑思维的确有可能压制创造力与想象力。逻辑思维讲究的是推理过程步步严谨，无懈可击。一个思维太严谨的科学家，可能想象力会受到一定束缚。比起英美教科书来，苏联教科书特别强调逻辑严谨，简直到了繁琐的地步，这是否影响了苏联科学家的创造性，还待社会学家们去研究。

但这个问题我看咱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咱们少的不是“天马行空”的“大师”，擅长的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连锁推论法”，欠缺的恰是对合理思维方式的基本观念。补偏救弊之道当然只能是普及逻辑思维教育，以期摆脱千年全民愚昧，不能因为担心出不了大师，便连这急需补上的一课也不敢讲了。再说，大师飞跃思考，还是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出现的。不懂逻辑的中国人“飞跃”了几千年，非但没有飞跃出个大师来，反而使得全民在浆糊桶里扎猛子扎到不亦乐乎。

4) “古代思想家使用的是高深的哲学思维，不能以形式逻辑去作简单裁判。”

在这方面，人之初对我的“批驳”最有代表性：

“老芦对老子理论的批判就更加摸不着边了。辩证思维东西要拿实证主义的东西来验证，完全是关公战秦琼。我这里没兴趣扯这个皮，但有一点：老外对老子的推崇不比咱中国人差，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中国现在有几个人信老子的？那么是不是证明了老外比中国人更笨？你说老芦这到底是在说谁更聪明啊？”

此话错误之多，说不胜说，只能择其大端而驳之。

前面反复说过，人类唯一可用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思维，所以它构成了验证一切理论的第一道标准。对不可能使用实证标准的学科诸如数学、哲学、心理学等等，它就是证伪的唯一标准。根据这标准，起码可以得出“老子‘学说’基本是错乱思维，此类逻辑笑话从不见于同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之中”的结论。

其次，老子的“辩证思想”，来自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肤浅观察甚至误解，在此基础上作了荒唐类比和归纳。既然他使用自然现象作论据，当然谁都有权“以关公战关公，以秦琼对秦琼”，指出那不过是他的误解而已。

例如对“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我早就指出那不过

是个劣等智力笑话：

“就连那个原初观察都暴露了老头子的糊涂：尸体是死后才坚挺起来，草木是死后才枯槁的。这儿的‘坚强’继发于死亡，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如果老头子的‘推理’成立，那么也应该是‘败兵则强，折木则强’，得先被击溃或被歼灭，军队才会强大起来，树木折断了才变得结实！”

哪怕起老头子于地下，他对此也不能置一词吧？他若如佛陀那样，根本不用可验证的自然现象作论据，那当然别人也就无法用实证主义来批驳。既然要把“兵强则不 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完全归纳命题建立在自然现象上，那别人当然就有权指出他连那最简单的现象的因果都弄倒了。难道因为他是太上老君，别人就自动失去了这权利？

第三，上文已经说过，如果哲学家只停留在形而上领域里，不要来管俗世的闲事，那当然实证主义也就无所用武。倘若要像老子那样介入红尘，教人如何组织国家，建立统治，或是如中世纪罗马教廷那样统治思想，那别人当然也就可以用世俗手段还击。是谁给了教会或哲学家们单向发号施令的“形而上”地位？

至于外国人推崇老子，此话不知有何根据，说的是哪个档次的老外？马悲鸣的《日本侵华与中国入藏类比》还有日本人巴巴地翻译为日文呢。难道外国人中就没有白痴？八卦还是“二进位计数”呢，那也能当真？

就算是人家的学术界普遍推崇也罢，这又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城里人想吃乡下野菜一样，无非是“隔河柳色更绿”的心理好奇而已。难道因为爵士乐是在非洲音乐启发下诞生，就可以认为非洲音乐比西方音乐更伟大？伏尔泰时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理想化，吹出那些梦话来，让你看了直想笑。就连到过中国的罗素，在《怀疑论》中美化中国的文字也让你喷饭，这只不过反映了文明的隔膜而已。

5）“指出古代中国人的愚昧，贬低中国的精神文明，其实是出自迷醉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奴才心理。”

这一条人之初也表述得很好：

“退一万步说，假设我们都同意老芦的那两条立论都是正确的，那么从这些理论可以得出中国人比西方人智力低下的结论吗？还是不行。因为老芦拿来证明的素材只能说明在解释世界的原理方面西方人比中国人成功，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没有异议。从这里要得到老芦的结论，从老芦极力推崇的逻辑思维来说，需要另外一个假设：就是‘成功的人一定聪明，失败的人一定笨’。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当然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失败者马谡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崇祯皇帝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拿破仑希特勒个个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智力低下，自己需要进医院。

所以说中国人现在的成就不如西方人和智力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是我们走错了路而已。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这没什么可耻的。‘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不如别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如人而来的自卑心理，更糟糕的就是自认劣等民族的奴才心理。一但心理上成了别人的奴才，成天抱怨自己的老祖宗不够聪明，自己的语言是

劣等语言，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再强的狗永远只能是狗，再弱小的狮子也是狮子，只有狮子才会得到他人的尊敬，拼命煽自己耳光的人永远得不到尊敬。”

这些话本身就反映了思维错乱，西方人解释世界比中国人成功，那是智力成就，不是什么世俗成就。这当然反映了人家的思维方式的先进，用俗话来说就是人家比咱们聪明，这和“以成败论英雄”有什么相干？如此说来，智商测定更是以分数定聪明，那就更荒谬了，是不是？谁都知道聪明人不一定成功，成功者也未必聪明，但不能为此就否认世上有智愚之别。他自己把智力活动的成功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混起来不说，还要把这“假设”栽到我头上来，当真有趣而且无聊得紧（这也算辩证法吧）。

我非但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而且还在过去反复强调，中国人之所以不善于思维，以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术问题是原因之一。古代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解释世界的欲望，唯一关心的从来就是尘世事务。老祖宗的问题还不是“解释世界不够成功”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试图解释之。我强调的是西方人对客观世界的无穷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思维方式的先进，并不是迷醉于人家的物质成就。哪怕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不承认古希腊人到达的智力活动高峰是同代中国人不可企及的，后世中国人就更别提了。例如燃素说、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的落体理论都是被证伪的假说，但能提出这种极度聪明而又能完美解释当时观察到的现象的大家，中国从来就没有出过。

我强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先进，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是为了咱们能像他们那样成功地解释和改造世界。我认为，西方的强大确实和人家的思维方式有关，这应该说是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正确先进的思维方式并不能防止他们干出自杀性质的蠢事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难以思议的蠢事。但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人想变得聪明些，似乎非得强调建立合理的思维习惯不可。如果理性思维成了习惯，咱们也就不会尽出那种义和团式的英雄了，甚至动不动就鼓吹核大战。

至于他对我本人大义凛然的谴责则了无新意可言，无非是我党推行了半世纪的“第一种忠诚”，亦即易牙、蔡京、贾似道、严嵩父子、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敬爱的林副统帅之辈的“忠诚”，其要旨就是一句话：“不拍马屁、实话实说就是汉奸奴才。”

其实要我拍民族马屁又有何难？只是真到了那辰光就不妙了。对于癌症患者，我是绝对不会实话实说的——去告诉对方那病非但不可救药，而且死前还要备受折磨又有什么意思？我之所以出来当“拼命煽自己耳光”的奴才，就是因为始终没有也不肯相信中国人真的蠢到没治了。

八、结语

综上所述，“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对实践毫无指导意义；作为思想方法，它违反了人类思维的工作原理，完全没有可行性。作为一门学科，它当然有存在权利，可以作为选修课留在哲学系里，但若当成国教强制推行，势必严重妨碍甚至防止学生培养理性思维能力。

因此，我的建议是，立即废除大中小学的政治课，代之以公民课和逻辑教育。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在教科书中强行塞入宗教内容，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新时代的宗教之一。刻下那

些鼓噪“废除中医”的勇士们若真有良知，并真的尊重科学，应该先去要求废除政治课。就算政府要保留这套强制教育，那也应该立即停止欺骗宣传，对师生说明那并非科学，而是根本就无从验证的宗教教义。

（全文完）

【附录】

老芦的毛病是以成败论智力

人之初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故项羽虽然兵败_下依然被视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以成败来论智力就更加等而下之了，老芦犯的就是这毛病。

老芦以如下两条立论试图证明中国人智力比西方人低下

“第一，我认为，无论东西方，全人类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逻辑思维。凡不符合逻辑的思维就是错误的思维。在这上头，没有什么‘东方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之分。

第二，我认为，思维方式是否合理，是成为思想家最起码的前提。思想模糊思维混乱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思想家。”

首先老芦理论的基础就错得一塌糊涂。如果“凡不符合逻辑的思维就是错误的思维”，那么统计学就该是骗子的学说了；量子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不再成立”，就是说按老芦的说法，构成老芦身体的基本粒子都是些错误的东西，一堆骗子加在一起构成了能够正确思维的老芦，这实在是上帝造人以后的第二大奇迹。我虽然也是搞科研的，还不至于成为这样的科学原教旨主义者。

顺便说一句，我没打算用“逻辑思维”来证明老芦错。要打倒一个理论，举个反例就足够了，就象我当初帮老芦打倒樊教授的‘伪善亦善’理论一样，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

老芦对老子理论的批判就更加摸不着边了。辩证思维东西要拿实证主义的东西来验证，完全是关公战秦琼。我这里没兴趣扯这个皮，但有一点：老外对老子的推崇不比咱中国人差，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中国现在有几个人信老子的？那么是不是证明了老外比中国人更笨？你说老芦这到底是在说谁更聪明啊？

退一万步说，假设我们都同意老芦的那两条立论都是正确的，那么从这些理论可以得出中国人比西方人智力低下的结论吗？还是不行。因为老芦拿来证明的素材只能说明在解释世界的原理方面西方人比中国人成功，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没有异议。从这里要得到老芦的结论，从老芦极力推崇的逻辑思维来说，需要另外一个假设：就是“成功的人一定聪明，失败的人一定笨”。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当然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失败者马谡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崇祯皇帝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拿破仑希特勒个个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智力低下，自己需要进医院。

所以说中国人现在的成就不如西方人和智力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是我们走错了路而已。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这没什么可耻的。‘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不如别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如人而来的自卑心理，更糟糕的就是自认劣等民族的奴才心理。一旦心理上成了别人的奴才，成天抱怨自己的老祖宗不够聪明，自己的语言是劣等语言，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再强的狗永远只能是狗，再弱小的狮子也是狮子，只有狮子才会得到他人的尊敬，拼命煽自己耳光的人永远得不到尊敬。